

英语类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实用汉英翻译

***PRACTICAL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主编 孔令翠 蒙兴灿

9

四川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实用汉英翻译

***PRACTICAL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主编 孔令翠 蒙兴灿

四川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实用汉英翻译

总策划: 陈国弟 张晓舟
责任编辑: 罗 悻
责任校对: 王 安
封面设计: 罗 光
责任印制: 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汉英翻译 / 孔令翠, 蒙兴灿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9

ISBN 7-5614-2407-8

I. 实... II. ①孔... ②蒙... III. 英语 - 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0047号

书名 实用汉英翻译

主 编 孔令翠 蒙兴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印 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6千字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3 001 ~ 6 000册
定 价 18.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 ◆ 电话: 85408408 85401670 85408023
- ◆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四川省高等师范院校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任：高林远 余正松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陈国弟 黄开国 靳 客 景志明 李 培 梁国平

凌 立 刘美驹 孟兆怀 欧天相 吴达德 杨胜宽

秘书组：陈建明 张晓舟 李川娜

四川省高等师范院校外语类教材编委会

主任：孙恺祥

副主任：杜 平 唐健禾

委员：（按姓氏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邓 刚 黄 毅 李 刚 廖荣柱 罗再香 蒙兴灿

任明崇 杨 勇 张云祥 曾令富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人们打破传统译论的束缚,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研究翻译中出现的新情况,以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各种翻译理论与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促进了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国际上,翻译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文化的角度转向;国内进入了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界正在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

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翻译实践的升华和提高。按照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辨证关系,以及按照美国翻译培训派的观点,理论对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本着这一精神,各地编写了大量的指导翻译实践与教学的专著和教材,促进了翻译教学的大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 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立,教育部关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鼓励编写具有创新特色的地方教材的精神的贯彻落实,社会对新型外语人才特别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同时也对高校的翻译教学特别是汉英翻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于西部地区的高校必须正视同发达地区外语教学的差距,并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加强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教学(尤其是汉译英教学)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体现汉英翻译教学的地方特色,我们在有关方面和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下,编写了本书。

本书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 翻译理论在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众所周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在长期的翻译教学和在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由于缺乏必要的系统翻译理论知识，对翻译问题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语言分析的层次上，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广度。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试图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对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进行扼要但是又比较全面的介绍，以便学生能对翻译的历史与现状、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概况、当今主要的翻译理论与流派以及翻译的发展方向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具体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指引方向和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这种做法与书名似乎有矛盾，但我们认为，虽然汉英翻译和英汉翻译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不能否认它们具有不少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那样，翻译的特殊性不能否定翻译的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算将翻译理论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讨论的原因。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和完善。在每一种文体翻译部分，我们专门对该类文体的翻译特点以及技巧进行了介绍，以便学生能对问题的翻译有理论的认识并在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文体翻译实践。

2. 反映四川的材料占有很大比例。为了体现本书的地方特色，我们在选材时非常注意，在翻译举例和翻译练习的选择上尽量突出西部特色，特别是四川特色，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既能掌握一定的翻译理论与技巧，又能加深对四川的认识。

3. 力求反映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无论是翻译理论的介绍、翻译技巧的讲解，还是翻译技能的训练，从内容上看都力求一个“新”字，从文体种类看都力求一个“融”字。

4.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实际紧密结合。本书在编写时既考虑了翻译爱好者的学习要求，又充分考虑了四川普通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构成和就业方向，比如常用的七大类的文体翻译训练将为他们从事口笔译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本书也可用作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的汉英翻译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大学出版社、乐山师院和绵阳师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乐山师院工作的美籍教师和留学生通读了全书的英文部分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乐山市外办的资深翻译钟为济先生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参加了一些具体的编写工作。我们在编写过

程中，还参考了许多国内外出版的书籍、杂志、报道和宣传材料。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不高、经验有限，再加上成书过程比较仓促，本书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2年6月

21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实用汉英翻译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佛经翻译	(2)
第二节 明朝以科技为主的翻译	(5)
第三节 清朝末期以后的翻译理论	(6)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翻译理论概况	(30)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32)
第一节 古代西方的翻译理论	(33)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至 19 世纪末期的翻译 理论	(34)
第三节 20 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	(36)
第四节 当代西方主要翻译流派及主要翻译 理论家介绍	(38)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	(38)
二、翻译科学派	(39)
三、翻译研究派	(52)
四、女权主义翻译理论	(54)
五、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	(56)
六、解构主义翻译派	(58)
七、释意理论	(60)
八、文化学派	(63)
九、信息论与翻译	(66)
十、“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	(69)

十一、“综合”或“多元互补”学派.....	(70)
第三章 汉英翻译技巧与训练	(72)
第一节 汉英翻译基本技巧	(73)
第二节 汉英翻译实例评介	(81)
第三节 汉英翻译技巧训练	(86)
第四章 汉英文体翻译	(118)
第一节 汉英文体翻译概述.....	(118)
一、语域的概念.....	(119)
二、语域与文体.....	(122)
三、汉英文体翻译.....	(123)
第二节 汉译英的语篇处理.....	(130)
一、散文翻译.....	(131)
二、外交文体翻译.....	(136)
三、法律文书的翻译.....	(144)
四、财贸类文体翻译.....	(150)
五、旅游文体的翻译.....	(155)
六、科技文体翻译.....	(161)
七、传媒文体的翻译.....	(165)
第五章 文体翻译综合练习	(172)
附录 参考答案	(184)
主要参考文献	(217)

21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实用汉英翻译

第一章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然而各民族、各国家语言不同，要交流思想就存在不可逾越的“通天塔”（Babel）——因语言不同而造成的语言障碍。要使交流思想的活动得以进行，翻译是必须依靠的手段和工具。长期以来，翻译在我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对外同各国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中外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分别发生在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晚清时期和最近时期，由此产生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中国的译学思想也就相应而生。

就我国的翻译史而言，原始社会因无文献可考，无法知道当时翻译的情况。夏商两代，因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对当时的翻译活动不可能了解得很多。到了周代，由于文明的发展，语言文字的进步，对翻译的记载就较多了。在周王朝的疆域内杂居着多个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各民族之间要彼此交流就必须借助翻译。《周礼》和《礼记》里都有关于翻译人员的记载。这些典籍讨论了翻译的必要性，并且提到了当时对翻译人员的称呼：“象胥”和“舌人”。

从宋代开始通用“译”或“翻译”。

宋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中说：“今通西言而云

‘译’者，盖汉时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故。”“翻”字的出现，源于东汉摩腾之译《四十二章》，而“翻译”两字的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开始了。

孔子对翻译的论述记载于《大戴礼记·小辨》：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公曰：“不辨，何以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意，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其乐，足以辨风艺；尔雅以观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

孔子的“尔雅”成为严复翻译标准“雅”的来源。孔子的另一句话对后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孔子虽然在这里主要谈的是史书在记载历史事件、人物、事物以及地点等所依据的方法，但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名词特别是专有名词音译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一节 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标志着中国翻译进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在汉武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

要在中国宣扬佛教教义，就必须大规模地输入佛教经典。佛教经典的输入必须借助于翻译才能进行。佛经的翻译便应运而生。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开始，盛于唐代，北宋时日渐衰微，到元朝已成强弩之末。

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西方和印度来的僧侣，另一部分则是本国的僧侣。

佛经翻译造就了不少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大师。下面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师。

安世高的佛经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据说开辟了“偏于直译”的先河。

据考证，支谦撰写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带有佛经翻译性质的翻译理论作品。虽然讨论的主要是佛经翻译，但其理论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较为普遍的指

导意义。他在《法句经序》中写到：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以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义。’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意，实宜迳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厥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从中可以看出，在支谦时代的翻译活动中，普遍崇尚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法。

东晋、前秦高僧道安在很多的佛经序文中都提到自己对翻译的见解，其中《摩诃钵罗若菠萝蜜经钞序》最为有名，因为他在其中率先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无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已。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中国译学思想史上可算首创，对后来的译经影响甚大。

“四大译经家”之一的后秦僧人、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但他同时认为，翻译虽然能保存原作的大意，但在文体和美感方面则有很大的损失。他对翻译最著名的一段论述，记载于《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

罗什崇尚意译，使佛经翻译面目一新。僧佑法师对此大加称赞，称之为“新译”，以别于以前的“旧译”。

东晋高僧慧远提出了“厥中”的翻译观，即将直译和意译有机地结合起来。

唐代是译经的鼎盛时期，最负盛名者是玄奘法师，他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在华夏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并称为四大译师，其中玄奘最为突出。佛教史家把罗什以前的翻译叫“古译”，把罗什及以后的翻译叫“旧译”，把玄奘及以后的翻译叫“新译”。

玄奘在 19 年的译经生涯中共译经论 75 部，1335 卷，占唐代新译佛经一半以上，完全可以说成就斐然。他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玄奘译经的质量创造了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

玄奘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不翻”的翻译原则上。他的所谓“不翻”，并不是省略不译，而是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所谓“不翻之翻矣”。这“五种不翻”实际上就是梵文汉译中的“不可译原则。”可见中国译学界讨论的“原文的不可译性”早在玄奘时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局限于佛经翻译而已。

在翻译技巧方面，玄奘主要应用了六种翻译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

宋赵匡胤时期，由法云主持编纂的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是中国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书不仅收集整理了前朝历代的译学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该书初步涉及了翻译的本质问题。讨论的问题主要有：首次以概念、范畴的形式阐述了翻译的实质；揭示了翻译过程中音与义的关系；首次提出了“以所有易其所无”的思想，这标志着中国译学思想已从“五不翻”的不可译性探讨转向了“洋化”和“归化”的思考。

我们所说的佛经翻译，主要指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也包括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除了佛经翻译外，各朝各代也大都设有处理掌管民族和外交事务并配有翻译人员的机构。凡周边民族或外国使节来朝时，翻译人员必须将所呈表文译成汉文。从翻译的内容看，除了佛经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

第二节 明朝以科技为主的翻译

到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与中国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进行翻译活动，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掀起了一个较大的高潮，翻译了一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自然科学方面著作的翻译意义尤为重大。这对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具有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所谓明朝的科技翻译，指的是把西方科技介绍到中国的翻译活动。明朝的科技翻译把我国的翻译带入第二个翻译高潮。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典籍也开始被较大规模地译介到西方。

我国的士大夫中，李之藻和徐光启对科技翻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徐光启的贡献尤为突出。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在介绍西洋自然科学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明确提出翻译是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他认识到“度数之学”在科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试图开展一个以科学化为目的的学术运动，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徐光启是明代科技翻译的先驱，他不仅跟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大量西方科学典籍，而且对中西文体、语体也进行了初步的对比探讨，特别是在译文的语体风格方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翻译家。

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和出版家。他翻译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有人认为他的译笔非常简洁，信达雅在译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还强调译者应加强译风译德建设。他是继徐光启之后的第二位科技翻译大家。他的主要译学思想可归结为：第一，首次提出了“形神并式”的译学思想，这无疑是“形神兼备”的华夏美学传统在翻译中的体现。第二，不但提倡翻译的“归化”，而且还注重通过翻译的“洋化”来丰富华夏语言。第三，明确提出了忠实原文的译学原则。

在西方传教士方面，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在与各方的合作，特别是士大夫的支持下在翻译方面取得了巨

大成就。他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与他人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法国人张诚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和其他人一道编纂了多种书籍，这些书籍被翻译成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在欧洲影响极大。应该说那是有史以来较大规模的汉译外活动。

意大利人殷铎泽 (Prosper Intorcetta) 翻译了《中庸》(译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 还与他人合译了《论语》; 奥地利人白乃心 (Grueber) 在所写的《中国杂记》一书末尾附有《孔子传》和《中庸》译文; 比利时人卫方济 (Francois Noel) 用直译的方法将《四书》《孝经》和《幼学》翻译成拉丁文; 法国传教士用拉丁文译《易经》; 法国人雷慕沙 (Abelm Remusat) 翻译《道德经》等。

总体来讲，明末清初来的传教士所译著的 300 多种书中，科学方面的书占 120 种左右，从类别来看，主要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矿山、冶金等。

在翻译理论方面，庞迪我 (D. de Pantoja) 认为，由于中西文字差别实在太大，因此翻译工作特别困难。他从实践中体会到，中外人士合作“对译”是解决翻译困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传教士认为，信是最重要的，翻译首先要“粗达言义”。在信的基础上，力争“兼通雅俗”，这样才能使经文或其他著作的翻译广泛地被人接受。有的传教士主张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解决翻译中存在的困难，反对不忠实原文而追求华丽辞藻的翻译方法。

第三节 清朝末期以后的翻译理论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国的翻译进入第三次高潮。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的 80 年间，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各种各样，但总的来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借翻译表达自己的某种主张，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中国开始进入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

清末最早组织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当首推林则徐，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设立译馆，编译过多种书籍。其中《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

部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译著。

冯桂芬在《采西学议》这篇文章中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从文明发展、科技进步的角度讨论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在当时背景条件下翻译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他认为，培养翻译人才对国家非常重要，因此他最早提议建立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公所。在翻译内容的选择方面，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主张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根据恭亲王奕訢的奏折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负责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衙门。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将翻译作为大事来做，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翻译与强国的重要关系。除了官方的洋务机构外，在华的教会机构也是传播西学的主要渠道。

当时翻译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李善兰、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华蘅芳、马建中等人。他们中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是科学家。

在译学见解方面，马建中较为突出。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给朝廷的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建议设翻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和有计划地进行翻译。他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即翻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二者的异同，掌握其规律。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原文的情况有全面彻底的了解，翻译时做到忠实于原文，将语法、修辞、文体、跨文化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应用于翻译，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简繁文体的变化、意义的细微差别，而且还要字斟句酌，把原文的神情语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要求译文读者在阅读之后能产生同原文读者一样的感受。

在外国传教士及其在华翻译机构的翻译方面，英国人傅兰雅及所组建的益智书会较为有名。傅兰雅在中国居留长达35年，以传播宗教始，以传播科学终，一生成就斐然。在翻译理论方面，傅兰雅认为，中国可创造科技新词汇翻译科技书籍以解决科技方面存在的困难。他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的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还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确立译名的方法。他主张有选择地翻译科技书，强调在翻译时中外译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确保翻译的质量。

洋务派和传教士所译的书籍对普及西方科技知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一部分统治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变法图强，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中国因此而进入维新时期。在此期间，维新派非常重视翻译，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和日本书籍。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倡导下，译书之风大盛，各报馆翻译了大量的东西文报纸和书籍。

维新派所宣扬和翻译的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论和民权平等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严复在翻译理论方面是我国翻译史上颇有建树的一位。他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较为明确具体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谈到了翻译标准，对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林纾（林琴南）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奇人。他不懂外文，只能通过跟人合作进行翻译。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将西方近10个国家的183种小说译成了汉字，可谓世所罕见。林纾虽然没有严复流传百世的译学思想，但却有跟严复相近的翻译风格。

梁启超把发展翻译事业、培养翻译人才上升到了救亡图存的高度。为了启发民智，他主张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更多地翻译政治方面的作品。他对我国历史上的两个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和明清时代的科技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通俗易懂，被人称为“日本文体”的新文体。他是译介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第一人，被称为西方诗歌翻译的先驱之一。

蔡元培提出了“横译”“纵译”“一译”“再译”的翻译思想。横译指异域语言的翻译，纵译指古今语言的翻译。由意识而为语言，叫一译。我国独有的文字相同而发音不同现象引发的将语言（方言）转为文字称为再译。

王国维在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发表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他的这篇文章是最早从中西思想方法比较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作为哲学家，他非常强调译语概念的严密性。

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在翻译方面都颇有建树。他们是清末翻译介绍欧洲新文艺的先驱。他们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强调文学作品翻译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他们认为直译方法是最恰当的方法，直译有利于保存与中国不尽一致的思想文词，保留译本的原味与洋味。周作人在